



青年—学界—劳工：《新青年》社群诉求的转换

何卓恩 张家豪

摘要：《新青年》一直被视为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启蒙刊物，实际上具体来说，它的诉求对象经历了青年、学界、劳工的更替。在第一阶段的上海时期呈现了“新青年、新国家”的青年启蒙主题，在第二阶段的北京时期主题转换到“新学术、新文化”的学界文化运动，第三阶段重回上海时期，主旨逐渐聚焦于“新劳工、新社会”的共产主义革命理论宣传。两次转换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作者群体构成与陈独秀角色的改变是重要因素之一。
关键词：《新青年》；社群诉求；青年启蒙；学术改造；劳工觉悟

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新青年》无疑占据重要的位置。有关《新青年》的研究成果在很多问题和细节上都有较深入的探讨，不过也有一些相习已久的说法未得到检视。比如在刊物性质上，一般都认定《新青年》是一个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启蒙刊物，或者说前期开展民主与科学启蒙，后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传播。但这种说法有大而化之的成分，因为无论用“民主与科学”概括其“早期”还是其全部，都是一种后设性意识建构，就其本来历史过程说，实包含更多的变化和更丰富的努力。本文试图回归文本^①，观察刊物诉求对象的转换，来重新解读《新青年》的性质，以推进《新青年》的再研究、再认识和再反思。

一、青年“最后之觉悟”(1915—1916)

鼓荡风潮的传媒，几无例外皆应时而生。《新青年》的创刊应对的是民初政治和社会的困顿。民国的建立为清季立宪与革命赛跑的结果。无论立宪或革命，都以寻求“富强”为核心目标。然而，民国并没有因为主权归民就自然引中华民族于富强之境，反之，中国社会遭遇巨大“秩序危机”和“意义危机”^②，时人痛心疾首，叹为“阳九百六之运”、“人欲极肆之秋”^③。在这种严重形势下，重建“文明”成为较实现“富强”更急迫的工作，而主要解决之道有二：部分知识人认为当下中国不适合实行共和体制，只有回到传统帝制和孔教的轨范中去才是活路；另一部分知识人，则认为国体重器不可轻变，既然民国已立，即当朝着现代秩序的方向积极进取，循名责实，建构真正的民主共和的文明。主张第一条路径的并非全是顽固守旧人士，领头的康有为、杨度、严复是老资格的立宪派领袖，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都曾是有影响的革命党人，甚至连政府的外国顾问、美国政治学名家古德诺也持相同看法。主张第二条路径的，立宪派以梁启超、张君勱、张东荪为代表，革命派则有吴稚晖、蔡元培、章士钊、陈独秀等人，还有胡适、李大钊、陶履恭等一批新近归国的留学生。中国社会再次形成两种路径的赛跑。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初称《青年杂

^①本文所考察的文本，以1915年9月—1922年7月陈独秀所主编或主持的《新青年》月刊（第1卷1号至第9卷2号）为限，不包括1923年6月至1926年7月瞿秋白所主编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理论季刊和不定期刊物的《新青年》。

^②张灏：《时代的探索》，台北：“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第100页。

^③严复：《与熊纯如书》，载王庆成、叶文心、林载爵：《严复合集》第4册，台北：辜公亮文教基金会1998年，第870页。

志》),便是这种竞赛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陈独秀多次与友人谈起,创办《新青年》主要就是因为他感到民国虽立,“中国还是军阀当权,革不成什么命,在中国进行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要从思想革命开始,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①，“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②。陈独秀在辛亥革命前办过《安徽俗话报》，二次革命后流亡日本与章士钊、李大钊、高一涵等人合办过《甲寅杂志》，都曾产生较大社会效果，这些经验使他看到了“改变人的思想”与“使共和名副其实”之间的关联。在《青年杂志》创刊号里，陈独秀除撰有《敬告青年》发刊辞和《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专篇，还译有《现代文明史》、《女人观》等文，以及以记者名义所作的答王庸工的通信，这些文字里反复宣示的，除了他“从思想革命开始”的见解外，都是他认为国民应具有的现代文明观。现代文明价值的宣导确实贯彻《新青年》始终，虽对“现代文明”的理解前后会有较大不同。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所呈“六义”受到今人普遍重视，而略微重视不足的是对于这些“普世价值”的诉求对象——青年社群的关注。按理说，“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改造对象应是包括所有国民的，过去无论立宪派还是革命派，都立足于全体国民提出政治诉求，前者如《新民丛报》，后者如《民报》。陈独秀所办刊物名之“青年”而不名之“国民”，有他特殊的考虑。一方面他对民初主张复旧和观念、行为保守萎靡的成年人群体绝望，一方面对少年老成的青年群体感到可惜。他觉得一般性的国民启蒙对成年国民枉费心机，不如“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雅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唯有中毒未深之青年尚不失鲜活，有救赎的期望，“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在他看来，青春对于个人为最宝贵阶段，“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之硎”，青年之于社会为新陈代谢最活跃的细胞，“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将国民精神改造的重点放在青年身上，便是为了使正被“陈腐朽败分子”同化之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③。

在以尊老为传统的中国社会，青年向来是被压抑的社群，直到晚清维新思想激荡的时期，才出现热情讴歌“少年”（实指青年）的思潮，如杨度的《湖南少年歌》、丁志先的《少年歌》等，影响最大的当属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篇发表于世纪之交的名作，期待中国由暮气衰朽的“老大帝国”蜕变成朝气蓬勃的“少年中国”，并指出“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④。《新青年》的“青年”论述更超越了梁启超的“少年”话语。其一，“少年”仍属中国传统表述，“青年”则完全是一个新概念。钱穆就说：“青年”二字为民初年的新词，“古人只称童年、少年、成年、中年、晚年，……乃独无青年之称”^⑤。“青年”取代“少年”，更减少了“少不更事”的联想，而增添了青春的气息。其二，梁启超“少年中国”主要言说的是有生机的新兴国家，陈独秀说的“青年”则迳指科举废弃以来以新式学堂学生为主的国民社群。其三，梁启超“中国少年”造“少年中国”的说法，虽有“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的强者逻辑，却尚未特别突出“少年”接受世界新文明洗礼之自觉；而陈独秀的“青年”话语，既肯定对于成年、老年的自然进化，更注重对青年精神气质之文明改造。

陈独秀寄望于青年社群，故刊物名曰《青年杂志》。其《社告》明确宣称：“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⑥后因与基督教青年会的《青年》同名受到起诉警告而被迫更名，仍不改诉求对象，只加一“新”字以为区隔（客观结果则在内涵上强化了青年社群的更化）。在迁入北京之前，“青年”始终为刊物主题。刊物结构大致为三部分：专论、诗

①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载《“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4页。

②任卓宣：《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与我的评论》，载台北《传记文学》第30卷第5号，第12页。

③陈独秀：《敬告青年》，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1期，第1页（《青年杂志》和《新青年》采每篇文章单独编码。注解中的页码为该文中的页码，下同）。

④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中华书局影印版1989年，第11页。

⑤钱穆：《中国文学论丛》，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26页。“青年”这个新名词，有人认为有可能是受到日本用词的影响，在当时的日本，“青年”已经成了学生群体的代称，陈独秀正是从日本回国后创办《青年杂志》的。也有人认为可能与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成立（1895）和影响逐渐扩大有关，《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就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刊物《青年》同名有关。

⑥《社告》，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封内页。

文和译述、编读通信，每一部分都凸显了这个主题。专论中，陈独秀除《敬告青年》之外，另撰《一九一六年》、《新青年》等文章论青年；高一涵有《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的连载；高语罕有《青年与国家之前途》、《青年之敌》；易白沙有《战云中之青年》；李大钊有《青春》；吴稚晖有《青年与工具》、《再论青年与工具》；刘叔雅有《欧洲战争与青年之觉悟》。译述部分也有世界各国谈青年的文章或著作，如《青年论》、《青年与性欲》，以及介绍各国青年团体的《日本全国之青年团》、《德国青年团》等。读者回应青年问题的文章有王淦的《时局时于青年之教训》、陈圣任的《青年与欲望》、李平的《新青年之家庭》等。

从主要作者专论青年的文章看，所阐述的内容，大致包括青年对国家的责任、青年所需要的新知识以及新青年应有的新道德等方面。

青年的责任，作者们普遍论及。高一涵揭橥专制国家与共和国家之差别，认为“吾共和精神之能焕发与否，全视民权之发扬程度为何如。……欲改造吾国民之德知，他者吾无望矣，惟在染毒较少之青年”^①。陈独秀强调文明进化的紧迫感，疾呼：“任重道远之青年诸君乎！……必昂头自负为二十世纪之人，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不可因袭十九世纪以上之文明为止境”，“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青年必怀此希望，始克称其为青年而非老年”^②。高语罕从中国社会现状着眼，指出：“吾国之民众矣，老者血气既衰，幼者年力未壮。而国势危亡，迫不及待。求於此十年之内，能以卓自树立，奋发为雄，内以刷新政治巩固邦基，外以雪耻御侮振威邻国，则舍我青年谁属？”^③易白沙结合世界大战形势，感觉“吾今日现在之青年，万难放弃之责任，不在追咎既往，与推测将来，惟在目前千金一刻之转瞬光阴，救父抗国保赤子践然诺而已。”^④李大钊则从青春活力的讴歌中，感怀“吾之民族若国家，果为青春之民族、青春之国家欤，抑为白首之民族、白首之国家欤？苟已成白首之民族、白首之国家焉，吾辈青年之谋所以致之回春为之再造者，又应以何等信力与愿力从事，而克以著效？此则系乎青年之自觉何如耳”^⑤。

青年承担国家责任，所需要的知识十分广泛，《新青年》所传播的各种世界文明知识，在编者作者们看来，皆为希望青年需要优先了解的新知识，而有关个人与国家关系的知识最为重要。高一涵认为青年自觉对于共和国之责任，首当了解共和国家为何物。为此，他撰写《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民约与邦本》、《读梁任公革命相续之原理论》、《自治与自由》等文章，对共和制度的基本性质，社会与国家、国家与政府、政府与国民、自由与自治的关系进行系统论述。易白沙《我》篇论述了个人、国家、世界的关系，对狭隘的爱国主义与融汇于世界主义的爱国主义进行了辨析。高语罕在《青年与国家的前途》中也论述了家族、学校、社会对个人的制约，以及人生生死、苦乐、自我与他人、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不过，对于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本质，论者观点不完全一致，显示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并存之局。

承担历史责任更需要道德上的进化，陈独秀认为“伦理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⑥。他希望青年要“自居征服 To Conquer 地位，勿自居被征服 Be Conquered 地位”；“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⑦。高语罕主张，强吾青年之道，在于导正其志趣，培养其道德，发扬其精神，首先要从克服惰性这个“青年之敌”做起^⑧。高一涵更注重青年的凛然难犯之概和庄严尊重之风，主张改造青年之道德从养成其自由精神入手，“发扬共和精神，根本赖此”^⑨，并以此为基础，加以“练志”、“练胆”、“练识”^⑩。作者们为了使青年实现人格独立和人生的自主与健康，还发表不少热心提倡“乐利主义”和西方人生幸福观、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展开激烈批判的文章，如高一涵的《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乐利主义与人生》，陈独秀的《我之爱国主义》、《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

① 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第1页。

②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第2页。

③ 高语罕：《青年与国家之前途》，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第1页。

④ 易白沙：《战云中之青年》，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第3页。

⑤ 李大钊：《青春》，载《新青年》第2卷第1号，第5页。

⑥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第4页。

⑦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第2～4页。

⑧ 高语罕：《青年之敌》，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第4页。

⑨ 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第6页。

⑩ 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第2～6页。

这一时期的《新青年》，基本上体现了一份“青年刊物”的本色，以青年为中心，晓之以大义，授之以知识，期之以涵养。读者以青年为主，亦能有所反响，有所对话，有所参与。但实际影响并未达到今人所想象的一鸣惊人、鼓动风潮之程度。周树人曾说，1918年以前《新青年》“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而且也没有人来反对”^①，这一情境描述，对最初两年也许尤其贴切。

二、“学报”的“新文化”(1917—1919)

1917年1月陈独秀受聘北大文科学长，随即将《新青年》迁到北大编辑出版^②。其带来的变化首先是，居于全国最高学府的地位，辐射能力大为提升；其次是作者队伍得到迅速而显著的扩张，北大教师和学生纷纷加入，不仅彻底改变了过去文稿紧张、有时陈独秀不得不包办近半篇幅的局面，而且刊物作者的构成演变为以学术群体为主。

陈独秀是安徽人，又曾参与创办《甲寅》杂志，所以早期《新青年》的作者以徽籍和《甲寅》人脉为主，这些人中有些后来也成为专业学者，但当时多不具有大学教授身份或不以学者心态做文章；北迁以后北大教授成为《新青年》骨干。陈独秀、刘半农、李大钊、高一涵等过去在《新青年》撰稿的徽籍或《甲寅》人脉作者，也已取得北大教授的职位。这就使得刊物的定位也开始发生潜变：虽然名义上仍以“新青年”相号召，实际的问题指向已经转变为新知识人该当何为。由于主要作者为北大颇有名望的文科教授，一年后编辑部发布启事，宣布“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③。即从1918年1月起《新青年》便改变陈独秀个人主编制，成立编委会，采取轮值主编、陈独秀负总责的制度，成为教授圈子内的“同人刊物”，也就是胡适后来所说的“我们的学报”^④。“学报”自撰自编，主要讨论的当然会是各自专业相关的话题，或者基于专业角度讨论社会公共话题。

编委会成员后来渐有调整，由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履恭、沈尹默、胡适六人，逐渐扩充到包括李大钊、高一涵、周作人、周树人等。这些主要作者中，胡适以文学教授兼治哲学，最关注的还是文学；钱玄同是语言学教授；沈尹默、刘半农、周作人都是文学教授；周树人后来也受聘到北大兼文学课程；陶履恭为社会学教授；李大钊为图书馆长兼经济学教授，因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所学为法政，回国后又办《晨报》，对社会政治兴趣浓厚；高一涵从日本明治大学政法系毕业回国，来北大任编译委员会编译委员，同时兼中国大学、法政专门学校政治学教授；陈独秀做为文科学长未任具体课程，个人治文字学，而其兴奋点始终与时政问题有关，学术情结略逊。这样一个作者群，很自然将刊物内容集中到文学问题、语言文字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之上。《新青年》曾声明“与北京大学毫不相干”^⑤，那只能说是体制上无关，从编委会的组成和作者的结构看，它已是北大文科学报的规模了。

不过这个学报也不是对全部北大文科教授开放，他只是文科“新”派教授的学报。《新青年》的作者群都崇新厌旧，钱玄同曾称：“独秀、叔雅二人皆谓中国文化已成僵死之物，诚欲保种救国，非废灭汉文及中国历史不可。此说与豫才所主张相同。吾亦甚然之。”^⑥这里一口气数出的陈独秀、刘文典、周树人、钱玄同四个激进反传统人物，都是《新青年》里的大将。钱玄同、沈尹默是北大文科教授中的主要派系浙

①鲁迅：《呐喊》自序，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41页。

②迁入北大的准确时间，尚无法确证。沈尹默回忆：“一九一七年，蔡先生来北大后，有一天，我从琉璃厂经过，忽遇陈独秀，我问了他住的旅馆地址后，要他暂时不要返沪，过天去拜访。我回北大，即告诉蔡先生，陈独秀到北京来了，并向蔡推荐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蔡先生甚喜，要我去找陈独秀征其同意。不料，独秀拒绝，他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我再告蔡先生，蔡云：‘你和他谈，要他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我把蔡先生的殷勤之意告诉独秀，他慨然应允，就把《新青年》搬到北京，他自己就到北大来担任文科学长了。”（沈尹默：《我与北大》，载陈平原：《民国大学》，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92页）以此，迁入时间应在1917年初。从《新青年》作者和内容变化看，到第2卷5号（刊标时间为1917年1月1日，实际时间可能有延迟）时，最显著的变化是以前可能担负编译和部分编辑工作的李亦民和他固定的《世界说苑》栏目，从此不再出现。与此同时，以往与陈独秀从无关联的北大教授陶履恭开始有文章出现。若此非偶然，则意味着迁入北大的进程已经启动。

③《本志编辑部启事》，载《新青年》第4卷第3号，封内页。

④唐德刚记录：《胡适口述自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00页。

⑤《本志编辑部启事》，载《新青年》第6卷第2号，封内页。

⑥杨天石等整理：《钱玄同日记》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26页。

江籍太炎门生系统中的“开新派”^①；刘半农曾在《时事新报》、《小说界》等新派刊物发表大量翻译和创作小说，是《新青年》早期介绍外国诗人和作家作品的作者；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都有着日本留学经历，是早期《新青年》推动“新青年，新国家”的骨干；周氏兄弟也是留学日本的新派思想者；胡适则是留学美国、在留美学生中也比吴宓、梅光迪等更为“激进”的新派。晚清兴新学以来，以西为新渐成风气，不少高等学校正式场合以说英语为时髦，“好像不用英语，就不足以压服学生”^②。语言如此，学问崇新者亦不会少。崇新的教授们希望以西方的新观念，对中国传统学术加以改造，形成现代中国的新学术。

《新青年》作者以语言文学学科为大宗，学术的改造因而以文学为盛。文学革命论的提出，以及新文学的大量尝试，成为这一时期《新青年》最显著的特征。文学改造的动议出自胡适，在1916年10月间已经透过与陈独秀的通信提出“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③，他正式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在《新青年》问世，陈独秀在次期以《文学革命论》相声援。此时陈独秀已经是北大文科学长，胡适也于9月到北大任教，新文学提倡更加便利。加之北大文学教授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兄弟的志趣相投，北大学生傅斯年等的积极响应，新文学运动便轰轰烈烈展开。《新青年》相继发表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胡适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论小说及白话韵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傅斯年的《文学革新申义》、《文言合一草议》，钱玄同的《新文学与今韵问题》，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等文章，申述文学现代化的主张，并与反对者论辩。他们一边坐而论道，一边起而行之，在《新青年》上发表体现新文学精神的作品，推出以周树人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为代表的一批新文学成果。文学革新连带引发文字学和艺术学的讨论，《新青年》上也展开了较大规模的汉字改良、戏剧改良的倡议。

文学话题一枝独秀，不等于《新青年》只是文学“学报”，政治学学者们的政治理论阐发也不少。首屈一指的高一涵在《新青年》早期译述和撰写的启蒙青年共和思想的系列文章，学术色彩已经较浓，进入北大后他又接着发表《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读弥尔的〈自由论〉》、《斯宾塞尔的政治哲学》等专业性更强的论文，并将杜威讲演录《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记录在《新青年》连载。其次是李大钊和吴虞。李大钊的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分两次在《新青年》连载，最早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介绍到《新青年》；曾留学日本法政大学的吴虞在《新青年》发表的很多文章主要目标在反孔教，其间也有政治学性质的论文，如《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等。其他作者间或也有讨论政治理论的文章，如顾兆熊的《马克思学说》、王星拱的《实行民治的基础》。

《新青年》同人从事专业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是陶履恭。陶履恭感慨：“社会，社会，此近来最时髦之口头禅，以之解释万有现象，冠诸成语之首者也。政治之齷齪，则归咎于社会；教育之不进，则溯源于社会。要之，无往而不社会。”他认为这种泛化的理解容易“诱人于迷途”^④。特别撰写一篇厘清“社会”概念的文章，指出社会的本质，实际上只是“成于个人之相往还”而产生的各种关系，体现为各种制度，“社会之进化，社会制度之进化而已”，所以社会问题不是人群败象之症结，而是制度不良之结果，改变不良制度正是社会中人每个人的责任。这就将社会“刷新”与个人的“振拔”结合在一起。在此意识前提下，陶履恭讨论了诸多具体的社会问题，写了《女子问题》、《新青年之新道德》、《论自杀》、《贫穷与人口问题》等专论，还为“社会调查”专栏写导言，从专业角度为社会调查提供理论指南。

社会学学科在《新青年》作者中人少却不势单，由于社会话题能见度高，关涉面广，最容易引发多学科的聚焦和公众读者的参与。李大钊写的《青年与老人》、刘延陵的《婚制之过去现在未来》、华林的《社会与妇女解放问题》、胡适的《我对于丧礼的改革》、陈独秀的《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等都可以说属于社会学视野里的讨论。《新青年》还设置“社会调查”专栏、“人口问题”专号、“工读互助团问题”专号、“劳动问题”专号等一系列专栏或专号，对当时中国突出的社会问题进行大规模研讨。值得注意

① 沈尹默：《我和北大》：“太炎先生门下可分三派。一派是守旧派，代表人是嫡传弟子黄侃，这一派的特点是：凡旧皆以为然。第二派是开新派，代表人物是钱玄同、沈兼士，玄同自称疑古玄同，其意可知。第三派姑名之曰中间派，以马裕藻为代表，对其他二派依违两可，都以为然。”沈尹默与其弟兼士立场同。见陈平原：《民国大学》，第87页。

② 沈尹默：《我与北大》，载陈平原：《民国大学》，第88页。

③ 胡适：《致陈独秀》，载《新青年》第2卷第2号“通信”，第2~3页。

④ 陶履恭：《社会》，载《新青年》第3卷第2号，第5页。

的,这些社会问题的讨论,对于《新青年》最终走向社会革命,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作为文科“学报”,《新青年》也吸纳众多作者,讨论其他学科的一些问题。比如哲学领域,除马君武、恽代英、刘叔雅、黄凌霜、张崧年等所译介之不同哲学流派,还包括陈大齐、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易白沙等人对“灵学”的质疑。经济学领域,可以看到章士钊的《经济学之总原则》、马寅初的《经济界之危险预防法》等论述。教育学领域的讨论甚至不输政治学和社会学,发表有教育家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读周春岳君〈大学改革之商榷〉》、《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等文章以及以北京大学名义发表的《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身处文科学长位置的陈独秀^①,也发表《近代西洋教育》,并就教育问题回答众多读者的提问;北京高师教务主任邓萃英的长篇专业演讲《动的新教授论》在《新青年》上连载;其他作者也有涉及改善教育的意见,甚至时为湖南第一师范学生的毛泽东,也发表了相当专业的《体育之研究》。一些作者还从总体上论述了现代学术的方法,其中傅斯年的《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从负面分析了中国学界的错失,王星拱的《什么是科学方法?》则正面说明科学方法的基本要领^②。

学术取向的拓展,不意味着《新青年》既有社会启蒙话题的断裂。在支持共和政治、反对复辟的政论方面,陈独秀继早期《宪法与孔教》、《袁世凯复活》等文之后,这一时期又先后发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复辟与尊孔》、《驳康有为共和平议》、《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等重头文章,以及《对德外交》、《时局杂感》、《克林德碑》等时评。李大钊则撰有《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连主张“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也有一篇《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的即兴演讲入载。而在“伦理觉悟”方面,这一时期不仅延续,而且扩展到青年以外。吴虞的《吃人与礼教》,陈独秀的《人生真义》,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贞操问题》、《美国的妇人》,周树人的《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张崧年的《男女问题》,陈启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王光祈的《工作与人生》,都是持续性的伦理革命的一部分。

学术不碍启蒙,反而推进启蒙。作者群的文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其他学科话题,均有向公共空间延伸的趋势,因为文学话题广泛影响到公共阅读,政治、社会、教育等话题则关乎民间思想和行为,这就决定了《新青年》的学术改造努力同时也是面向全社会的“新文化运动”。学术性与公共性结合,寓思想于学术,以学术促思想,这种学术社会化的进路使《新青年》的社会影响力得以显著扩大,尤其经过与五四运动的相互激发,1919年下半年开始,《新青年》真正取得引领潮流的地位。

在“新文化”运动的阶段,《新青年》的意义演化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③,这一目标不是一般青年所能达成,而是有学养、有视野的学人的责任,所以其诉求对象已转移到知识界。它对新知识人力量的调动(如钱玄同、刘半农协议邀约周树人加盟),对保守派知识人的打击(如钱玄同、刘半农为打击林纾所演出的“双簧戏”),都是以学人为诉求对象的印证。这一阶段,“青年”不再成为刊物的论述主题^④,主要作者文章中直接谈“青年”的只有李大钊的《青年与老人》、陶履恭的《新青年与新道德》等少量文章,这些文章基调在于要求青年导正“新伦理”中的误区,而不是强调青年的责任了。

三、“劳动者底觉悟”(1920—1922)

如果说早期《新青年》呼吁的是青年的伦理自觉,中期《新青年》鼓动的是学界的学术自觉和文化自觉,那么后期《新青年》则呼吁的是劳动者的阶级自觉^⑤。

在第二阶段,《新青年》已经出现对劳工的讴歌,如蔡元培庆祝欧战协约国胜利的著名讲演就刊于第5卷5号上,提出“我们不要羡慕那凭藉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

①早期《新青年》只有陈独秀撰写的《今日之教育方针》(第1卷第2号)一篇文章正面论述教育问题,这篇文章主要是从觉悟青年的立场反观教育。

②王星拱:《什么是科学方法?》,载《新青年》第7卷5号,第3~4页。

③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载《新青年》第7卷第1号,第7~12页。

④读者成为这一时期延续“青年”论述的主力,先后在通讯和读者论坛发言的有:李张绍南的《哀青年》(第2卷第6号)、李次山的《青年之生死关头》(第3卷第1号)、朱如一的《青年之自己教育》(第3卷第5号)、郑佩昂的《说青年早婚之害》(第3卷第5号)、罗家伦的《青年学生》(第4卷第1号)、邓萃英的《文学革新与青年救济》(第5卷第1号)、郭仁林的《告青年》(第5卷第1号)等。但根据《新青年》编辑部启事,读者专栏乃为容纳社外异议而设,不一定代表刊物立场。

⑤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载《新青年》第7卷第6号,第2页。

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顾问咨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并对劳工的未来充满信心，“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不过，他说的劳工不限于体力劳动者，“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是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①。

但到了1920年5月，在蔡元培题词“劳工神圣”的《新青年》“劳动节专号”上，劳工的内涵已发生改变。陈独秀特撰《劳动者底觉悟》一文，明白无误地放弃了对于学界的信任和信心，认为“读书的”跟“做官的”一样，都不足以称“有用”和“贵重”，“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陈独秀这里的“劳动者”，已经没有商人、学人，而是纯粹物质财富直接生产者的工农群众了。他对社会上重官重学轻劳工的偏见深恶痛绝，提出，“我们现在一方面盼望不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无用的下贱；一方面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有用、贵重”^②。劳动者自觉其价值，不是用以自我慰藉，而是要承担起改造社会的责任。这显然是接受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结果。

《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经过，学界一般认为李大钊功莫大焉。李大钊在第5卷和第6卷里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重要文章和办了“马克思主义专号”，不过无论从李大钊在《新青年》中的地位，还是这几篇文章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内容比重，都不足以显示《新青年》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新青年》整体基调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以劳工解放为言论宗旨是从第7卷逐渐开始的，这与《新青年》主编体制的改变和主编人思想的变化有关。

陈独秀以激进的战斗精神投入到新学术、新文化运动之中，激起了不同见解学人的激烈学术反弹，也招致学术思想论敌情感上的憎恨。1919年3月间，陈独秀“嫖妓”风波出，林纾等受过攻击的人坚决要求北大开除陈的教职，汤尔和、沈尹默、钱玄同当初引荐陈进北大的人，也要求蔡元培严处。4月10日，蔡元培宣布取消文科学长职位，陈独秀离开北大势所难免。在此之际，恰逢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发传单而被捕，成政府眼中之危险人物，营救获释后只得南下上海避祸。鉴于南下的陈独秀没有稳定收入，《新青年》编辑部决定停止轮值主编制度，恢复由陈独编，陈遂将《新青年》带离北京，在上海进行编辑，由北京同人继续供稿。陈独秀本来在《新青年》中属于爱谈政治、做政论的激进派，在北大期间受胡适等“二十年不谈政治”约定的制约，略有克制，到上海后脱离了北大同人的制约，便放手发挥。而在南方（上海而外，一度还留置广州），戴季陶、李汉俊、李季、沈雁冰、沈玄庐、沈泽民、袁振英、杨明斋、李达、陈望道、周佛海、陈公博、施存统等一批共产主义信仰者很快聚集到他的周围，成为《新青年》新的作者队伍，并逐渐成为刊物主力。陈独秀本人也迅速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并开始向职业革命家转变。

第7卷1号《新青年》发布新的《本志宣言》，宣布“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③，标志着陈独秀开始急速的转变。到了第5号“劳动节专号”，开始发生质变。这个专号在《新青年》发刊史上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这不仅因为它的前所未有的超大篇幅极大地凸显了劳工问题的重要性，更因为一个社会学视角下的“社会问题”在性质上从此转化为世界共产主义思想下的“社会革命”的逻辑起点。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实际上就完成于这个专号，明确提出要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颠倒成“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在次期的第8卷1号，陈独秀撰有两篇重要文章，一篇是《论政治》，一篇是《对于时局之我见》，很完整地表达了他新的认知、新的信仰和新的使命感，鲜明显示他已经完全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了。此后《新青年》专设了“俄罗斯研究”专栏，由他的共产主义南方同道很系统地介绍苏维埃劳工社会及其制度。社会调查专栏继续保持，但从过去的包罗万象变为突出对劳工处境的揭露。

当然，《新青年》转向诉求于劳工阶级的革命觉悟，并非一种断崖式的转换，而是呈现出北京作者与

① 蔡元培：《劳工神圣》，载《新青年》第5卷第5号，《新青年》第5卷合订本，第439页。

② 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载《新青年》第7卷第6号，第1页。

③ 陈独秀：《本志宣言》，载《新青年》第7卷1号，第1页。

上海作者共生、文化运动与劳工运动并存的面貌^①。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既宣传马克思主义,也传播杜威、罗素的思想;既有《社会主义与中国》(李季)、《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李大钊)等劳工阶级革命的论述,也有《新历史》(陶履恭)、《儿童的文学》(周作人)、《国语文法的研究法》(胡适)等继续鼓动新学术、新文化的文章。这一过程中,北京同人也处在是否继续维持共同体的纠结之中。随着《新青年》政治“颜色”越来越明显,北京同人最终与之分道扬镳,《新青年》实质成为成立未久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宣传刊物。

对于《新青年》第三阶段的变化,胡适后来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回忆:“自1920年1月以后,陈独秀是离开我们北京大学这个社团了。他离开了我们《新青年》团体里的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时日推移,陈独秀和我们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我们也就逐渐地失去我们的学报。因为《新青年》杂志,这个[传播]‘中国文艺复兴’的期刊,[在陈氏一人主编之下]在上海也就逐渐变成一个[鼓吹]工人运动的刊物,后来就专门变成宣传共产主义的杂志了。最后终于被上海法租界当局所查封。”^②

四、结 语

受到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和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等带有自身偏好的言说影响,关于《新青年》的性质,今人多泛称其为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启蒙刊物。回归文本细加观察,这种说法显然不够精确。实际上,《新青年》经历了三个显著不同的阶段,分别有着不同的作者群,诉求于不同的社会群体,有着不同的目标和内容:其第一阶段的两年,作者以陈独秀友人为主,体现出皖籍和《甲寅》系的特征,他们对青年寄予改造社会的责任,期待青年觉醒率先成为现代公民,支撑共和国家;第二阶段的三年多,作者以北京大学文科新派教授为主,他们基于学术改造而讨论现代学科的建设,并认为学界中人应该承担起更新文化、再造文明的使命;第三阶段时近三年(不含瞿秋白主编时期),上海共产主义作者群逐渐主导言论,将根本改造国家的希望置于劳工身上,聚焦于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理论宣传,以唤起劳工阶级革命之觉悟。时间长度上三个阶段大体相当;办刊效果上“新学术、新文化”阶段的作者阵容最强大,社会影响最广泛;但三个阶段各有特质,不可彼此覆盖。

鉴于此,对于《新青年》的评价,或许也可以有一些新的看法。《新青年》其实是一个大部分时间名实相分的刊物,在它的第二、三阶段实为“新学界”、“新劳工”,虽然它的读者客观上很可能还是以知识青年为众。“科学与民主”对于《新青年》,纵然可谓贯穿其始终,各阶段涵义亦明显不同。“新青年”阶段重点捍卫了民主共和制度,阐释了青年人格的独立和人生的自主与健康的意义。“新学界”阶段在继续捍卫民主共和制度和人格独立的同时,重点阐发的是“科学的”学术和文化精神。“新劳工”阶段将劳工解放视为最彻底的民主,将马列主义理论视为最可靠的科学。而就北大时期新文化运动而言,它的意义也特别值得重新估定。由于新文化运动是以学术改造的形式展开的,一方面学术运动与社会文化运动互相促进,另一方面学术与思想之间也呈现出内在紧张:文化新陈代谢的使命感和紧迫感,使得本以科学相号召的学术反而丧失了科学学术所需要的从容和包容,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术的扭曲;而学术的争胜影响到文化的走向,也加剧了《新青年》创刊以来即已表现出来的激进倾向,造成社会文化观上的形式主义和极端主义。“破坏有功,建设无力”的讥辞,对于短短几年的《新青年》或许有失公允,但确实值得后人反思。

●作者地址:何卓恩,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Email:hezhuoen@163.com。

张家豪,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09&ZD069)

●责任编辑:涂文迁

① 欧阳哲生:《〈新青年〉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以1920—1921年同人书信为中心的探讨》,载《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82页。

② 唐德刚记录:《胡适口述自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00页。